

改革开放40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及演变逻辑

王炎龙,麻丽娜^①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均取得巨大成就。文章通过梳理40年来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探究其演变轨迹特征,从而归纳产业发展逻辑,助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文化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实施和实时调整,切实营造了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氛围,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持久的动力和支撑。十九大报告对文化产业政策的重视,将进一步促使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业态不断延伸,产业模式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文化产业; 产业政策; 改革开放; 政策发展;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5-0040-07

DOI:10.13967/j.cnki.nhxb.2018.0091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厚积薄发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5462亿元,这个数据比2004年增长了9.3倍。其中,文化服务业、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巨头,其为GDP创造的价值逐年递增。党的十九大正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党章,既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也说明近年来文化产业效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作用力显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务院、文化部、广电总局、文物局等部门牵头,推动文化产业法规和政策大规模密集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完善了国家文化产业体系,落实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所提出的要求,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得以如此迅速发展的源头,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上层指导,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文化产业政策的不断尝试与修正,而文化产业的未来革新要建立在通过对过去政策的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世界各国的文化形态涌入国内,国内的文化发展开始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新的态势。这之后的文化政策从文化市场到产业扶持,经过了40年之久的变革。仔细梳理这40年间的重要文化产业战略,不难发现,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的,在对文化产业的宏

观把控和微观认知上,相关政策的切实推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考方向。

一 相关研究回顾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文化产业概念本身及文化产业发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公认的“文化产业”起源于“文化工业”概念,是由哲学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1]。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文化产品,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依靠文化产品在商品流通层面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逐步建构。也就是说,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展构成,没有文化产品的原始积累,产业根本无从谈起。反过来,文化产业的系统运行可以促进文化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为了能够通过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文化产业政策应运而生。我国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风潮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起初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继而开始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观点^[2]。学者戴锦华认为,文化批判理论更适合研究“文革”期间的文化产业政策,而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产业发展不能仅仅持批判态度^[3]。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是围绕文化经济和文化管理的相关研究展开的。1985年的《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正式将“文化”归

收稿日期 2018-07-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资助(编号:17JZD042)

作者简介 王炎龙(1972-),男,湖南双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为产业范畴。至此,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才算真正开始^[4]。“文化产业”的概念首次在十六大报告中被厘清,学者们开始集中研究文化产业的相关议题,逐步从国家政策过度到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上。在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里检索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发现,原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简要梳理的内容研究。如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所做的《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类型分析》,梳理并归纳了2002年以后的十大类文化产业政策^[5];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姜孝钦在《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一文中,厘清了文化产业政策的概念,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的建议^[6]。(2)对国内外文化产业政策机制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张建民发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撑,为此,他分析了韩国当代的文化产业管理和发展模式,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方向^[7]。张慧娟则在《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一文中致力于对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8]。(3)对国内部分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大多基于当时的文化产业政策,如《陕西省文化产业资金供给政策的不足与优化——基于江苏、福建、河北、四川四省的比较》就是根据其他四省的文化产业资金类政策供给的制定模式,为优化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资金供给政策提供经验支持^[9]。此类文献所涉及地区较广,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也包括诸如河南省、山东省等经济欠发达地区。(4)对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的反思研究。这一类研究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产业研究风潮而出现的,如博赫的《文化研究三十年:现状与特点》、方彦富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兴起》等关注的是我国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

基于以上的分析发现,对于文化产业政策的内容研究大多局限于十年之内,从改革开放后梳理到十九大的文献极少,而我国当前的文化产业政策阶段性特征显著。因此,研究改革开放后40年的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规律及特征,对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政策、促进文化产业成为新型国民支柱产业大有裨益。本文将通过分析研究文化政策自1978年至今现行的文化政策,运用文献分析法对这期间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梳理文化政策的线性脉络,多维度展现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逻辑,探索其发展

之道及绩效成果。

二 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线性脉络

“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初次在政策中问世,是199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在《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中提出的。但该概念在文化产业政策中正式运用,是在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诸多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以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之举。这一建议的提出,也标志着文化产业彻底剥离出体制内的文化事业,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至此,“文化产业”一词正式登上文化发展史的历史舞台。因此,1992年和2000年是文化未形成产业前和文化产业政策成型后的两个关键分隔点。自我国加入WTO后,现行文化政策的数量逐年递增,直至2006年达到一个顶峰状态,但后续文化政策数量持续回落,直至2011年后文化政策调整,才开始回暖,到2016年时我国现行文化政策数量已高达600多条,成为改革开放后文化政策数量的最高值。因此,2006年和2011年也是两个研究文化政策演变轨迹的重要分隔点。

(一) 文化政策探索期: 事业化主导夯实市场化基础

这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1年。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一时间各行各业显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势头。但文化事业在这一阶段仍旧处于政府监管状态,文化政策数量不多,还未形成“产业矩阵”。国务院与文化部出台的相关政策多集中于广告业、大众服务业等个别行业^[10]。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该属1984年的“以文补文”活动,国家鼓励文化事业单位利用知识举办讲座、设计广告,或开办有偿服务型的活动,以此来补贴文化经费,为更好地开展文化服务工作提供资金保障。从这一年开始,文化部和财政部正式承认各体制内文化事业单位,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1980年,中共中央开始实施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总结并反思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过多限制文艺工作的诸多弊端,明确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任务内容,即要在总结经验的前提下保证文艺工作“百花齐放、百家齐鸣”。该通知是我国当代文化政策极具特色的转折点,体现了文艺工作服务取向的多元。另一方面,“以文补文”的活动也在同时期持续发展,官方条例涉及广告管理,并不断优化;对报

社、期刊、出版社也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又将“以文补文”活动发展到媒体、出版领域。这一系列政策,均为文化活动转为文化产业做了铺垫。直到1988年由文化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我国文化走向市场化的发展路径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肯定。

政策打通文化市场的一大成果就是娱乐性文化开始萌芽。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上海市和广州市率先引进录像机并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打造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为广告正名》一文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当代广告业开启了新纪元,各大电视台、报纸的广告投放明显增多。

(二) 文化政策过渡期: 制度化规范提升产业化程度

这一阶段是从1992年至2000年。1992年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面临新的形势,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体系相结合。因此,培育和发挥市场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开山之举。在这一国家政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发展体系也逐渐明朗起来。

1. 文化经济政策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这也意味着,文化发展不再依赖政府管控,而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孕育下的企业化发展模式。同时,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文化经济政策。但文化经济政策的完善依赖于调整文化产业布局结构,改革文化管理机制后的自身发展,政策的领航作用彰显无遗。为此,国务院推出了文化经济政策三步走的方案: 首先,为了系统研究文化经济政策,成立“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的课题组。其次,为了拓宽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渠道,又完善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协助文化产业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体制。鉴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之道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最后又推出诸多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财政和税收政策,有力地鼓励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

2. 出台了多部行政法规,规范文化产业体制建设。

文化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的引导。这一时期由

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机构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数量众多,涉及的行业与范围也很广,诸如规范拍卖行业、明确职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实施路径的法律条文; 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扫除文盲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等行政法规。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有序管理,为文化产业建设的制度规范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1992年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增速极为明显。据北京市统计局于1999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文化行业(包含旅游行业)所创造的增值约为281.2亿元,占当年全北京市所创造的GDP的14%^[1]。为了满足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要求,各大报社发行了包括文化类、休闲类等多种内容类型的报刊,打破从前以党报为主的传媒局面。

(三) 文化政策转型期: 多元化结构增强市场化地位

这一阶段是从2001年至2006年。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紧接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十六大报告初次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地位逐步确立,其所能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前景指日可待。这一时期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以扩张为主,国家集中出台了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文化政策,帮助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1. 以鼓励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的政策为主。

十六大正式将文化发展分成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发展两个方向,这一举措被称为“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此后,相关部门开始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所在。“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有助于产业内部的多样化,二者的共同发展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同时也是2005年中共中央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

此外,2006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文化产业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创新力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还出台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产业政策,国务院致力于管理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维护互联网经营者和上网用户的利益,保障了互联网营业场所经营与上网活动的健康发展; 信息产业部提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动漫原创行为,从而推动动漫产业链业态的形成和成熟发展^[2]。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文化产业发展。

2.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制改革政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国务院在这一时期规定,现代企业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事业单位需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企业化管理,推动股份制改造。广电和新闻出版单位成为以“创新机制、面向市场”为转型方针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制改革的排头兵。这一期间的文化政策密集出台,涉及行业融资、集团化建设、人才改革等,政策重心均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发展多媒体以顺应企业制改革的需要等方面。2001年至2006年,新闻出版和广电行业用了6年时间,基本完成企业化转制改革。体制改革催生了70余家文化产业集团的成立,包括中国广电集团、中国出版集团,还包括30余家报业集团、5家电影集团和10余家出版集团,这些集团的组建和发展,集中整合了传媒文化资源,提高了我国新闻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3. 产业准入政策加速文化体制改革发展。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标志着国家发展的重心已经落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推动文化产业跻身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行列。同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制定了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运行的总体方案,将文化体制改革推向新的发展矩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实践表明,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行得通,这一发展模式也逐渐被应用到文化建设领域,首先就体现在政府出台了诸多产业准入政策,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2005年政府表明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姿态,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等社会事业领域。这一阶段的文化经济政策相当灵活,非公有资本可进入文化产业、文化领域能够引进外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介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等,延伸了非公有制资本准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边界。此外,关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统计政策也在这一时期萌生,如2005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文件,文件汇总了文化产业的财务状况和就业人员等指标现状。200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数据,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数据的首次亮相,此后的文化产业发展终于进入了有据可依的时代。

产业的准入政策激活了文化市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基本确立。同时,在体制改革的刺激下,社会

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建设的比例加大,非国有文化部门所创办的经营单位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五分之四^[1]。此类单位创办了处于当时国内前沿的对外文化交流公司、演出公司等,使得众多文化要素朝向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

(四) 文化政策成长期: 特色化产业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这一阶段是从2007年至2011年。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文化繁荣的部署战略集中在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同时,繁荣文化市场依靠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从2007年开始,我国新修订的文化产业政策数量增速放缓,各行业全力投身于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中。200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文化系统产业工作会议,总结了之前探索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的成果和经验,规范了文化产业发展“又好又快”的标准。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在2009年之后有了小幅度的调整,为尽快度过金融危机,国务院重新规划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强调了加快文化产业振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8年也是广电行业转企改制的关键性一年,截至2010年,出版单位基本完成企业改制工作。

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开始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倾斜,产业组织逐步优化。2007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提出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规划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的标准,厘清了文化建设的标准,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文化部调整了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规定,为博物馆等文化场地得以免费开放创造政策条件。2011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我国已建成公共图书馆2884座,博物馆2435座^[1]。公共文化服务的践行还引发了全民阅读的风潮。为推行全民阅读政策,做好全民阅读活动,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切实提高农家书屋使用率等具体举措,有效提升了国民文化软实力,为图书出版行业的经济回暖指明了方向。值得一提的是,着重发展文化产业仍然是“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战略性政策之一,也是迈出十九大提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第一步,文化产业发展依旧刻不容缓。

(五) 文化政策扩张期: 融合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一阶段是从2012年至今。如果说党的十六大为文化产业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十七大为文化

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那么经过十八大的政策推动,十九大的召开,就成为推进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决胜之举。经历了短暂的战略收紧阶段,新时期的文化政策又呈现了新的现象:

1. 覆盖体制、人才、金融、融合的全面扶持政策。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九大政策推行,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经过四十年的试水和反复实践,已经摸索出一条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建设之道。现阶段我国运行的文化产业政策涵盖体制建设、人才培养、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和产业融合几大方面,基本构建了一条多部门协调、党和政府全面扶持的政策联通网。以人才培养政策为例,2016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强调,明确改进人才制度的战略目标、冲破束缚人才的机制,才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政策。《意见》的提出,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全国人才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文化产业融合政策也可圈可点。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离不开互联网、金融业、科技行业的发展,文化与旅游、农业的融合离不开农家乐经济的发展,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则得益于“互联网+”聚合效应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以文化产业与金融业融合的政策为例,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深入分析了文化与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为开发具有文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制定了规划。除了金融业之外,2014 年国务院还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发展任务和实施策略。政策的融合发展助推了文化产业跨界的具体实施方案,加快了强国建设的速度和幅度。

得益于全面覆盖的文化扶持政策及良好的国内外文化发展环境,这一时期的文化产业增长劲头强势,实现飞跃式增长。2012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1.8 万亿元,2016 年实现 3.1 亿元,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3.77 亿元^[3]。2017 年的文化增值占 GDP 的比重已达到 5%,这一数据为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一目标增加了可能性。这一系列文化增值的创收,包括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电影业的贡献,其中仅电影《战狼 2》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 56.8 亿票房收入,打破了中国电影史的记录。

2. 国际化竞争趋势明显,“一带一路”盘活政策困局。

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软实力代表,是我国

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重要筹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无论是从资金、技术还是人才、管理等多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但经过 30 多年的运作与发展,经济和财政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体制化改革孵化出的大型公司为文化产业“走出去”争取了价格优势,健全的产业政策为我国在国际文化战略部署中捍卫了话语权。“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是相当重要的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文化部出台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等政策,既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传声器^[4]。传媒、旅游、教育等文化政策的实施,将会直接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益,极大地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巩固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2017 年,我国和 157 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主办了诸如“中美文化论坛”“东亚文化之都”等合作论坛,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首届金砖国家文化节等文化交流活动,铺设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合作网络,同时扩大了中国的文化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线的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则主要通过在全球各地设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实现途径,截至 2017 年底,全世界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已达 35 个。

3. 数字文化创意政策激发“文化+”潜能,唤醒产业新发展。

文化创新是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主线。2017 年“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为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当前我国主流文化及亚文化的核心消费者,均呈现低龄化、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与其对应的高品质文化也在崛起。一方面,网络付费催生了传统文化向数字文化的转型,数字技术推动横向文化产业不断探索新模式。“文化+旅游”打造特色文化小镇,赋能产业化升值“文化+科技”搭载人工智能、VR,优化博物馆、影视行业发展战略。文化价值逐渐凸显,文化产业向集约化、数字化方向不断拓展新空间^[5]。“互联网+”持续带动文化产业不断向“文化+”的方向拓展,据文化部公布的文化公报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 45 个文化试点城市拉动文化消费 900 亿元,145 个文化试点单位的文创产品全年经营近 15 亿元。以腾讯为龙头,文化与科技双驱并进推动了网络文学、音乐、电影、动漫的迅猛发展,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的数据显示,2017 年网络文学用户达到了 3.33 亿,其创造的网络文学年产值高达 90 亿元。中国网

络文学已跻身“世界四大文化现象”。另一方面,适合地方经济体制的文化创意政策带动全产业链。上海出台“文创50条”,成都发布《建设西部文创中心行动计划》,政策红利重点扶持文化产业向优质产业端发展,优化产业环境,从而打造城市品牌核心竞争力。

三 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核心出发点

文化产业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一脉相承的。但不论其外延可以拆解成多少领域,其根本内涵仍旧是完善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以这一目的作为根本落脚点,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化产业政策会发现,尽管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核心出发点还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党和政府主导,带动产业升级。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政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以坚持党的先进文化为行动导向。这一宗旨可完整地体现在重大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上,党委宣传部拥有总指挥的权力,相关文化部门负责拟定政策文本,贯彻落实政策的实施。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方式,最直接的优点就是可以保证各垂直领域政策的迅速落地。如十七大提出要优先开发新型文化产业,文化部率先制定并发布《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制造头部效应,财政部随即响应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具体办法,助推动漫产业的升级。

其二,中央与地方协力,协调区域发展。一般情况下,中央出台的文化政策,推及到各省市的时候,都会与当地出台的地方性文化政策相结合,这一点是文化产业政策与其他国民经济政策的显著不同。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极其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率先出台《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宏观把握规划的发展方向;国家级旅游、公共事业、科技、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版权、文化保护、传媒产业等细分领域的平行政策规划纷纷出台;随即地方垂直领域的政策应运而生。内蒙古自治区和武汉等省市出台相关政策统领地方文化发展,而相应的地方细分政策也于同期制定,安徽省侧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杭州旨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攀枝花市着力于广电传媒产业等。各地区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和经济特点,在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的前提下,开展适合本土产业发

展的文化政策,有利于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政策的能动性。

其三,改革与转型并举,平衡产业结构。我国的产业结构分配不合理,长期发展不平衡。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高效发展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的重要目标。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平衡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快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正确的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产业政策,注重改革和转型两头抓,部分行业如广电、出版等老牌产业,因管理内容问题众多,机制太过老旧,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升级,相应的文化政策以“改革”为主,但是像动漫、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政策的推行能够优化文化产业机构和组织体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政策的侧重方向则以“转型”为主。

四 结语

当今社会的文化产业,与政治、经济产业的各个维度联系紧密,在政策、资金、技术、需求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十九大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会集中在转变文化思维、建设文化人才和搭建业态几个方向。在整理和汇总各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现,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政策是一种调控手段,在兼顾市场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目前文化产业政策带动文化产业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尚有问题存在。一方面,文化产业政策能够监测经济发展态势,实时提供政策引导,推进文化产业走向市场化,逐步健全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但是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政策,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干预政策极有可能导致企业为追求规模化而脱离经济现状;战略性补贴政策能够带动以数字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新兴产业发展,却也很容易由于过度投资引发后续连锁反应。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权由相应部门管控,公众利益的诉求有所偏颇,价值观导向性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按照十九大文化强国理念和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要求,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8年必将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国文化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字创意产业政策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优质内容与强势IP、公共空间构建、技术的创新都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政策引导、资本准入和技术支持这三驾马车前,文化产业必将担当起社会建构、文化建设的重任。因此,只有掌握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逻辑与

时代经济的核心出发点,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观继续扩大文化产业力量,深入完善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才能确保文化产业稳扎根基,并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的本质——重建文化产业的认知维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15.
- [2] 马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改革与战略,2017(2): 99-102.
- [3]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4] 欧阳友权,江晓军.问题聚焦与政策论证: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 132-137; 15.
- [5] 江凌.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类型分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1): 90-97.
- [6] 姜孝钦.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J].学术论坛,2015,33(5): 181-185.
- [7] 张建民.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启示[J].东北亚论坛,2012,21(3): 72-74.
- [8] 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2.
- [9] 陈蓉,李芳芳,冯竞谊.陕西省文化产业资金供给政策的不足与优化——基于江苏、福建、河北、四川四省的比较[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4): 1-8.
- [10] 杨吉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
- [11] 王晓方.谁在说话——中国文化年报(2001年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 [12] 祁述裕,孙博,曹伟,纪芬叶.2000—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研究[J].东岳论丛,2015,36(5): 57-64.
- [13] 范周,杨乔.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30-43.
- [14] 马建堂.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 [15] 张晓明.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改革报告(2015-2016)[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6.
- [16] 蔡尚伟,车南林.“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产业挑战及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7(4): 158-162.
- [17] 范周,关卓伦,孙巍.回首与展望:新时代下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J].出版广角,2018(4): 6-10.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Logic of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Yan-long, MA L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logic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The phased implementation and real-time adjust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has effectively created a people-oriente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tmosphere and provided more sustained momentum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atten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n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current cultural system reform, the cultural format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industrial model will usher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development; cultural innovation